



西学经典研究
文献系列

20世纪 亚里士多德 研究文选

聂敏里 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世纪 亚里士多德 研究文选



聂敏里 选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文选 / 聂敏里选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617-7312-3

I. ① 2… II. ① 聂… III. ① 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3) — 哲学思想 — 研究 — 文集
IV. ① B502.2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9603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西学经典研究文献系列

20 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文选

聂敏里 选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万 骏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1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35
字 数	5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312-3/B·515
定 价	8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纪念苗力田、唐夕华老师
两位宽厚、仁慈的长者

序

一

西学东渐已逾百年,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也已超过了百年。在这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经典原著,但是,现在是向着一个更深的层面转变的时候了,这就是,由对西方哲学经典原著的翻译更多地转向对西方哲学经典研究文献的翻译。如果说对西方哲学经典原著的翻译构成了西学东渐的第一个阶段,那么,对西方哲学经典研究文献的翻译就应当被称作第二个阶段,而现在就是向着这第二个阶段转变的时候。因为,只有在对经典研究文献的研究中,我们才深切地认识到,经典原著绝不是仅仅以它的原初文本的形态孤立存在着的,相反,它存在于漫长而浩繁的研究文献之中。研究文献,尤其是经典研究文献,不仅实际地塑造着对经典原著的诠释传统,而且本身就是经典原著的活的思想的延续。由西方哲学经典原著和西方哲学经典研究文献所构成的一个在时间中延续的整体才是真正而又真实的西方哲学的学统,仅仅经典原著本身是不足以构成这个学统的。同理,仅仅对经典原著本身的译介是不足以把握这个学统的。我们要全面地、深入地把握西学,就不能只停留在对西方哲学经典原著的译介上,而必须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对汗牛充栋的西方哲学经典研究文献的译介上去。只有这样,我们才深入到了活着的西方学术传统的内部,我们对哲学经典原著的研究才不至于是低水平的重复。

但是,惯常的情形是,人们轻视研究者的著作,而更为重视原著。这看起来似乎是对的,因为仿佛有一个极其正确的理由,即哲学史上那些被公认的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中含有更多的真理的要素,而它们的研究者似乎只是一些残渣剩屑的吸食者。但是,这一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且不说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本人

必定首先是作为他人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开始他们的哲学工作的;也不必说即便是那些仿佛微不足道的研究者的著作中也必定含有或多或少的真理的要素,他们也是真理的积极的探求者,并且以他们的研究本身充实着他们所研究的经典著作的真理内核;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任何一个哲学的研习者来说,若不首先从那些研究者的研究著作,尤其是那些经典的研究著作,开始他们对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的研习,那么,他们将不仅要重复以前所有世代的人曾经做过的工作,而且他们依据他们的几乎可以说是空白的知识对那些伟大哲学家们的研习也必将是极其苍白而贫乏的。因此,与其凭着自己那些未经训练的、东鳞西爪、自己也不明所以得到的见识贸然地去直接面对伟大哲学家们的经典原著,以为凭自己的天资和聪颖就可以得出压倒前人的洞见,不如首先细致地去研读前人的研究著作,在理清了潜移默化支配自己头脑的、种种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见的基础上,站在一个极为坚实和高起点的平台上,再去研习那些伟大哲学家们的原著,收获显然要大得多。所以,与哲学教师们经常给学生们的“首先去读原著”的教训相反,我的主张却向来是,首先去读你要读的原著的最经典、最权威的研究著作,在此之后,你会发现你对原著的见解将大为不凡,当你再去阅读原著时会有更多的更新、更深的发现,而如此一来无论是思想还是学术就都进步了。

有多少西方哲学的经典原著,就有与之相应的多得多的研究文献,它们不仅以分散的书面形式、而且还以学派的形式体现出来。实际上,学统现实地存在于学派当中。这条规律对于绝对经典的哲学原著尤其适用。例如,柏拉图的哲学不仅仅存在于他的那些现存的对话作品中,而且实际地存在于从古到今的柏拉图学派和柏拉图主义中;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不仅仅存在于他的那些现存的手稿中,而且实际地存在于从古到今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中。这样,研究柏拉图,研究亚里士多德,就不能以仅仅研究他们的原著文本为满足;相反,更大的、更艰巨的任务在于研究他们各自所形成的学派和主义中的浩繁的诠释文献。在这里几乎有着清楚可查的传承脉络,而后人的思想(更不消说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认识)实际是受着这些传统潜移默化影响的。因此,理清这些传统也就是在理清我们自己的思想;而理清了我们的思想,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才会更加清楚。而只有通过这样一个艰辛的上下求索的过程,我们才可能真正面对问题本身,对问题本身有真正决定性的思考。因此,决不要轻视并非伟大的哲学家而只是学问家的那些人的研究性著作,正是这些人用他们的辛勤的劳动在帮助我们理清这些传统、直面问题本身,阅读其中的一本胜过直接阅读原著十遍甚或百遍。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

而就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漫长学统而言,众所周知,从亚里士多德歿后的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学派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诠释工作就在进行,但是,在那个时候,研究者与其说是在从事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和诠释工作,不如说是在继续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因为,古代的学派与其说是一些服膺某位宗师教义的信徒和诠释者的集合,不如说是一个学术研究共同体,他们在一起共同进行彼此都感兴趣的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曾经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完全按照亚里士多德自己思想的逻辑进行诠释的研究发展得要更晚一些,可以说它是同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纂工作几乎同时开始的,在这里,按照亚里士多德自己的思想来诠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原则开始逐渐成为一个首要的原则。但是,毋庸讳言,进入公元1世纪以后,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学派已经不再是古代世界中主导性的学派,从而,安德罗尼柯所编辑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集也就从某种意义上为其他占据主流的学派据以阐释自己感兴趣的思想主题提供了资料。所以,明显可见的是,在这个时期,无论是斯多亚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还是基督教的哲学家们,都参与了基于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诠释和研究,而他们需要证明的是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例如,在菲洛庞努斯那里,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种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而新柏拉图主义的一系列哲学家,例如波菲利、扬布里柯、辛普利丘等,也都多少不等地是从柏拉图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并且更愿意将亚里士多德哲学看成是进入更为深奥的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学习初阶。因此,可以说,在公元1世纪以后,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学者,而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对亚里士多德的诠释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留下了大量有关亚里士多德各种著作的注疏。但是,在这个总的趋势下,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最伟大的诠释者,生活在公元二三世纪的阿弗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他在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诠释传统中的地位就凸显了出来。因为他是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内部进行诠释的。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注释,并出于解决亚里士多德哲学内部存在的困难的课题,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造了一个内在关联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体系,并据此形成了他考察一切问题的原则立场。他是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研究者,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构成了古代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存在于拉丁世界的这一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在从公元 6 世纪到公元 11 世纪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西欧人除了波埃修翻译并注释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和《解释篇》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一概不知,当然也就谈不上任何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但与此相对照,在拜占庭帝国、叙利亚和新兴的阿拉伯帝国,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却不仅得到了保存,而且得到了传播与研究。它先是被翻译成叙利亚文,接着又被翻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的哲学家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了可以说是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并且第一次赋予亚里士多德以超过柏拉图的哲学声誉,“哲学家”这一在阿拉伯人看来独一无二的称号唯独给了亚里士多德。这样,从公元 7 世纪到公元 11 世纪,相对于西欧世界古典文化的衰落和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消歇,在东方的阿拉伯世界却存在着一个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时期,它分别以巴格达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中心,形成了所谓的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前者的代表是著名的阿维森纳,而后的代表则是对于整个西欧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产生深刻影响的阿威洛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阿威洛伊主义在西方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名词,经由阿威洛伊诠释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成为经院哲学家们构筑他们的神哲学体系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 12 世纪上半叶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重又传入西欧。首先传入的是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接着,自从 1204 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大批的希腊古典文献重又回到了西方,其中就有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文抄本。这样,一个新的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阶段就在西欧的经院中重新得以展开,而与之相伴随的就是理性在西方的复兴。在此之前,统治经院哲学的主要是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但是,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在经院中的流传和逐渐成为正式的教授文本,亚里士多德主义便取代了柏拉图主义,成为经院哲学家们用以思考神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主要思想工具。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所固有的逻辑性、科学性和经验性给弥漫着柏拉图主义的中世纪吹来了一缕清新的空气,科学精神开始在这个到处充满了神秘通感和精灵鬼魅的世界里逐渐苏醒。在这场思想范式的转变中,代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便是托马斯主义和所谓的拉丁阿威洛伊主义,而代表柏拉图主义的则是以波纳文图拉主义为核心的传统的奥古斯丁思想路线。最后,随着托马斯·阿奎那在 1323 年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册封为圣徒,这场复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斗争就以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欧经院中成为正统而告终。这是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个持续的胜利。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在西欧各主要学术机构中都成为常规性的教授科目,亚里士多德关于宇宙自然的思想也成

为西欧人认知世界的主要思想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的经院哲学就是活着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就是从各个角度在与现代思想的碰撞与激荡中不断得到诠释和发展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进入现代以来(我把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欧洲历史理解作现代),由于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兴起,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不断贬值的过程,正像人们日益厌倦于经院哲学的繁琐而无法实证地论证一样,人们同样对亚里士多德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哲学的思考方式感到厌倦。在这里,稍稍引证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拉姆斯(Peter Ramus, 1515—1572)回忆他的求学生涯的一段话,就可以清楚地反映时代空气的这一变化:

我们花了 3 年 6 个月的时间研读经院哲学。之后,根据大学规定,研读了《工具论》里的各篇论文,进行讨论,再做一番苦思冥想(在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中,那些论述论辩的著作在 3 年课程里,尤其要一读再读)。按部就班地做完那一切以后,我合计了一下埋头于经院学问的日子。很自然地,我开始寻找运用那些废寝忘食而习得的知识的目的。我很快就意识到,所有那些篇章既没有给我以更多的历史和古代知识,没有使我的辩才有所长进,也不能使我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不能使我更机敏更圆滑一些。呵,多么地无知,多么地让人忧伤!在经历过千辛万苦之后,我却采集不到、哪怕是看一眼那些被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辩里能找到的异常丰富的智慧之果!我该怎样悲叹我不幸的命运、贫乏的思想!①

这就是现代兴起之际人们的时代感受,哪怕是对于以博学和智慧著称的亚里士多德!熟悉近代哲学史的人会知道,像这样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态度也同样见于奠定近代思想基本格局的培根和笛卡尔。于是,人们出于对经院哲学的厌倦而厌倦亚里士多德,相应地,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也就再次消隐下去。

但是,进入 19 世纪,情形又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随着黑格尔主义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编纂学的运动主导了欧洲学术界,人们第一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古代思想,主张采取中立、客观和历史的研究态度来对古代思想进行系统地梳理、研究和论述。这样,大批的哲学史著述开始涌现出来,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哲学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这是一个一直持续到当代的学术运动,它根本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既有格局。简言之,现在,人们不再是作为一个亚里

① 转引自杜布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 5 页。

士多德主义者,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立场来研究和诠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著作;相反,人们仅仅是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著作作为一个严谨而客观的学术研究对象来加以细致地分析、梳理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再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体系,而被认为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并且发生过影响的一个思想体系,人们有必要对它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和评价。在这样一个总体的时代思想氛围下,一方面,我们看到哲学史的著述每年以成百上千的规模递增,相应的就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论述的文献也在不断地累积;而另一方面,与哲学史著述相关的哲学史文献的整理、编纂工作也在不断地深入。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的编订。这是由柏林皇家科学院的贝克尔(Bekker)和布兰迪斯(Brandis)从 1831 年到 1870 年历时 40 年编辑完成的,总共 5 卷,其中第一、第二卷是贝克尔主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文本,第三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译本,第四卷是布兰迪斯主编的从古代以来的重要的注释,第五卷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洛瑟辑录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残篇,一部分是由伯尼茨编的《亚里士多德索引》。其中由贝克尔主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文本通称为贝克尔标准本,所有对亚里士多德原文的学术引用都是依据这个版本的页码和行号,从而大大方便了学术研究和交流。这样,可以说,进入 19 世纪以来,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上的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研究取代了对亚里士多德的学派研究。

正是这一研究格局的根本转变,使得从 19 世纪结束以来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特征。在 19 世纪结束之前,根据古代而来的学术传统,人们把亚里士多德思想和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也就是说,没有人会采用历史的眼光,把亚里士多德思想和著作看成一个在时间中渐次发展和形成的对象,而是认为流传到我们手上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们即便作为一个思想整体缺乏现代思想体系所要求的那种特有的逻辑严密性,但是,毕竟构成了一个思想整体,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完整的思想规划和在这一规划下所进行的一个多多少少系统而严谨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具有历史主义的哲学史眼光的黑格尔那里,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他也同样是把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著述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来加以论述的,他所批评的只是这个思想整体缺少像他的思想体系一样的那种严格的逻辑演绎的特征。

但是,正是因为受到 19 世纪以来兴起的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的编订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客观、深入地分析和研究的文本,于是,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研究者在以客观、中立和历史的学术研究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思想和著作时,一个突出的倾向就是,他们不

再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看成一个完整、共时、逻辑的整体,相反,从对文本进行客观、细致的学术分析和研究的角度出发,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看成是历史的产物,是伴随着亚里士多德个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间痕迹。

例如,当纳托尔普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文本进行研究时,他发现,《形而上学》第四卷和第六卷在各自对形而上学的表述上存在着一个十分明显的分歧,即,前者认为形而上学是一门关于存在本身的普遍科学,而后者则认为形而上学是一门关于一种可分离的存在的专门科学,即神学。因此,由于受到 19 世纪历史研究和疑古思潮影响,纳托尔普便断定,既然两种观点彼此抵牾而不可能都真,因此,第六卷便有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真作。我们看到,对后世希腊哲学史的编纂产生巨大影响的德国著名哲学史家策勒同样接受了纳托尔普的这个发现,不同的只是他认为这一文本上的抵牾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自身的不成熟和矛盾。显然,从这样一种观点再往前走一步,亚里士多德思想自身发展的观点就非常容易得出,而这就体现在了 20 世纪最伟大的德国亚里士多德研究者耶格尔的著作当中。耶格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亚里士多德,他的基本发展历程》(*Aristotle, 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中,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早期著作残篇和后期成熟著作的详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经历了早期的柏拉图主义的神学研究阶段,渐次发展到晚期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经验科学的研究阶段。值得指出的是,耶格尔的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献编纂学家们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残篇长时期辛勤搜集和整理的工作,正是由于残篇的发现和整理,以及残篇中明显存在着的和人们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的成熟思想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才作为一个事实被发现。

耶格尔的研究开创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发展论格局。人们尽管可以就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他的各种具体著作相互之间的时间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提出种种与耶格尔有别的看法,但是,从发展论的立场出发来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and 著作进行研究却成为 20 世纪以来的研究主流。我们看到,20 世纪上半叶英美亚里士多德研究界的领军人物罗斯即属于这个阵营,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领导英美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欧文也属于这个阵营,即便是汉语学界熟悉的陈康先生也属于这个阵营,他出版于 1976 年、对西方亚里士多德研究界产生影响的著作《智慧:亚里士多德追寻的科学》(*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就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作品。发展论的研究思潮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看到,出版于 1987 年的格雷汉姆(Daniel Graham)的《亚里士多德的两个体系》(*Aristotle's Two Systems*)一书

仍旧持续了这一研究方向,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以《范畴篇》为核心的著作和以《形而上学》第七卷为核心的著作展示了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

发展论作为 20 世纪主掌整个亚里士多德研究方向的研究方法将自古以来的整体论研究立场不断地边缘化。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又展现出新的生机。发展论的研究方法指责整体论为了体系的缘故,在发现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明显矛盾的地方时,往往自出机杼构造一套并非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逻辑来对矛盾之处予以弥合,或者将彼此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文本放在一起以建立实际上是研究者自己假想的思想体系,甚至草率地断定矛盾文本中的一种为伪作,以保证假想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体系性,因此,整体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具备科学性;但是,新兴的整体论思想同样反过来指责发展论不科学:每当发现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看似矛盾的地方,发展论的研究并不作深入、细致的考虑,就轻率地断定其中存在一个思想发展的关系,仓促而武断地在其中建立起一个时间的顺序。80 年代重新兴起的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对古代整体论研究方法的简单恢复。首先,它不是学派性质的;其次,它更强调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做更为深入、细致、客观、全面的研究,在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看起来明显矛盾的地方时,首先不要忙于像从前的整体论者那样轻易地赋予其某种基于单一体系的逻辑性,也不要像发展论者那样轻易地在其中建立某种时间顺序的关联,而是要立足于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整体的更为全面、周全和深入的考察,尽可能消除这种表面的、实际上由于不理解才产生的思想矛盾。这样,从总体上,进入 80 年代以来,学者们更倾向于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做具体、细致的研究,谨慎于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做整体、全局的判断。研究更为小心、更为周全,因而研究的结果也愈加科学和可靠。

这就是西方两千年以来围绕亚里士多德의思想和著作的诠释形成的一个明显有迹可循的学统,它构成了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成熟、自足的学科,拥有自己严格的学术规范、清晰的学术传承和稳定的知识累进机制。在这个学统内部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它们建立在充分继承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更为深刻、准确、全面的理解,因此也从一个特殊的立场澄清着人们在哲学这个领域关于世界和人的思考。

三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西方亚里士多德学术研究的传统的基本认识和理解,尤其是针对于近百年来西方亚里士多德学术研究的新动向,本书将关注的目光

集中在从 20 世纪初一直到目前为止以英美为主的有关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研究文献的编辑和翻译上。本选集总共收录了 22 篇现当代英美学者关于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按此顺序读下去,读者自然不难发现近百年西方学者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清晰线索。

在这 22 篇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文章中,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我选了罗斯的 3 篇文章、欧文的 3 篇文章和弗雷德的 3 篇文章。这不仅因为所选的文章都是亚里士多德研究中的经典论文,而且因为这三个人是 20 世纪以来英语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前后相承的三个阶段的代表。罗斯无疑是 20 世纪初英语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袖,而欧文是 20 世纪中叶英语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的第一人,这没有疑问。至于弗雷德,视其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英语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军人物,这大概也是没有疑问的。罗斯的两大部煌煌巨著《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 20 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的经典注释,迄今仍是一切研究亚里士多德这两部著作的学者必读的参考书,可谓管钥现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研究之枢机秘府。本选集所选的两篇文章,《〈形而上学〉的结构》和《〈物理学〉的结构》,即分别出自这两部作品的导言部分,是进入《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研究之堂奥的必备参考。欧文在整个亚里士多德研究领域的大名恐怕无人不晓,现在活跃于亚里士多德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都曾受教或受益于他,他也是第一届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两个发起人和召集人之一(另一个是杜林)。正是按照他的提议和计划,1957 年在牛津举办了第一届亚里士多德学会会议,它聚集了当时亚里士多德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为数不超过 30 人,就一个专门论题作为期数周的研讨,而研讨的论文结集出版,以构成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标志。亚里士多德学会的这种会议模式成为传统,一直被延续了下去,迄今已经举办十届,而第十届的两个召集人之一就是弗雷德(另一个是查尔斯)。弗雷德是研究晚期希腊哲学出身,但实际上,在古希腊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他都是一个活跃而富有创见的人物;同时,无论在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上还是哲学史研究的视野上,他都具有高屋建瓴的独到眼光。他和帕齐克两人合著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 卷:文本、翻译和注释》(*Aristoteles, Metaphysics Z: Text,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是到目前为止有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 卷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他本人所写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尤其是有关谓词理论的论文,尽管篇数不多,但每每能打开人们的思路,开创新的研究格局。

有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本选集除了选取 20 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研究中公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者的代表论文之外,还力图将论文选集的范围覆盖亚

里士多德研究的各个领域,以期使读者明白,亚里士多德研究是古典学中一个成熟的学科,它具有严谨而细致的领域划分。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本身的研究,而且还包括属于校勘学的、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文本的研究,属于目录学和文献学的、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的研究,属于效果史、影响史研究的、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诠释传统的研究,属于学派史研究的、对亚里士多德学派传承和发展的研究,以及属于比较学的、对亚里士多德同其他思想家之间的相互思想关系的研究。而具体到对亚里士多德思想本身研究的领域,如众所周知的,按照亚里士多德自身思想的学科划分,又可以细划为一些子领域,例如,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诗学、修辞学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领域加在一起才构成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全貌。在所有这些领域,整个 20 世纪都涌现出了大量具有严格的学术累进效应的代表性的作品以及基础性质的研究成果。本书便试图尽量覆盖所有这些研究领域,以期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反映西方 20 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成就。

因此,读者可以看到,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学的研究方面,本书选取了洛德的《论亚里士多德全集的早期历史》一文,该文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篇针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集在希腊化时期的编纂情况、依据古代流传下来的三份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书目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为我们能够历史、客观地审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构成情况提供了一个深入分析和颇具创见的视角,当然,其中也部分地涉及到亚里士多德学派在希腊化时期的一些情况的介绍。

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诠释传统、从而也是其效果史和影响史的研究方面,我首先选取了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索拉比的长篇论文《古代注释家论亚里士多德》,这是他为 he 主编的《变化的亚里士多德——古代注释家和他们的影响》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它概括地反映了亚里士多德诠释传统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作为从效果史和影响史的诠释学方法出发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范例,我选择了朗的《菲洛庞努斯的亚里士多德:处所的广延》。这篇文章深入比对了研究了菲洛庞努斯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著名的论述空间的第四卷的注释和亚里士多德本人在第四卷中具体的论证,从而向我们具体展示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具有物理性质的空间概念如何转变成一个仅具有几何学意义的广延概念,从而为后来流行的人们关于空间的认知奠定了观念的基础。很显然,就此而言,这篇文章具有特别发人深省的特点,为我们具体地理解一个观念在其流传过程中如何通过具体的诠释而发生偏转并且产生现实的思想效应提供了帮助。

在对亚里士多德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的比较研究方面,我选取了罗森的代

表性论文《实践智慧或本体论：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思想同亚里士多德思想具有甚深的渊源。早在弗赖堡大学任讲师其间，海德格尔就开设了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课程。^② 而到马堡大学任教授职位后，亚里士多德同样是他授课的重点，其中，在 1924/1925 学年他开设的有关柏拉图的《智者篇》的课程中，有一半篇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尤其是其中的第六卷的深入研究。因此，理清海德格尔思想同亚里士多德思想之间的这样一种秘密的债务关系，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而罗森的这篇论文便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它不仅是对海德格尔思想本质的一个阐明，同时也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本质的一个阐明。在我看来，罗森应当是施特劳斯学派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具有理论的敏感性和健全的常识感，凭借这种禀赋，当面对极其复杂、甚至看起来多少有些高深莫测的理论时，他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并且依据对实质的领会来切中肯綮地评论理论本身。在《实践智慧或本体论》这篇文章中，罗森就深入评论了海德格尔在《柏拉图的〈智者篇〉》中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 *phronesis* 的诠释，既指出了这个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所应当具有的理论内涵，又指出了经过海德格尔诠释后它所具有的海德格尔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且通过两者的深入对比，指出海德格尔在对人类生活理解上的本体论倾向，可谓切中海德格尔思想要害，同时也就向我们展示了罗森本人所倾向和同意的回到常识的观点。对此，有心的读者可以通过对该文的阅读悉心鉴查。

而进入到亚里士多德思想本身的研究领域，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当然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主题，这个主题不仅关涉到我们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全局的把握，也曾经牵动过 20 世纪绝大多数学者的神经。在这个方面，代表性的作品当然就是前面提到的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他的基本发展历程》一书，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我选择了罗斯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和欧文的《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一些早期著作中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期向读者传达 20 世纪在这个主题上前后不同的两种发展论观点。罗斯的这篇文章是对 20 世纪上半叶围绕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这一主题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的一个概述。罗斯本人是一个发展论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他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基本观点上也非常接近耶格尔。所以，透过他的这篇文章，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发展论初期的主流观点，即把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视为由忠实于柏拉图主义向着他自己的反柏拉图主义思想的演变。但正是这个对亚里

② 参见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 154—172 页。

士多德思想发展历程的描述在欧文的那两篇文章中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欧文本人当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论者。但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历程有一个与耶格尔派迥然不同的看法。他反对耶格尔派所提出的那样一种较为简单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模式,而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早期的反柏拉图主义向着晚期的柏拉图主义回归的过程。对比性地阅读罗斯和欧文的文章,不仅会增趣不少,也使我们一览 20 世纪鼎盛一时的发展论思潮的概貌。

但是,如前所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们又开始谨慎地恢复一种整体论的研究视角,一个基本的理据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现存著作作为他的讲稿,这些讲稿反复讲授、不断修改,直至他的思想的晚年,因此,它们在整体上一定是协调的,尽管不排除其中会有一些思想发展的痕迹。为了介绍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态,本选集收入了基尔的一篇综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最新进展的论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再思》,其中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研究为切入点讨论了从 80 年代开始的整体论研究方法的复兴。根本而言,当代学者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上的态度更为谨慎。绝大多数学者已经摒弃了那种宏大叙事的研究视角和方式,无论是传统的整体论的还是发展论的,而更注重对亚里士多德的每一部著作,甚至每一部著作中具体的每一卷、每一章的深入研究,谨慎地得出观点,并认为这种谨慎得出的局部真理强过主观臆造的全局真理。这个方面的典型体现就是作为第十届亚里士多德学会研究成果的专题论文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Lambda 卷》(*Aristotle's Metaphysics Lambda*)。这一论文集由弗雷德、查尔斯两人主编,它集中了像阿克利、伯恩耶特、卡恩、索拉比这些知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著名的神学卷即第十二卷进行逐章的讨论和解释,它反映了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中的主流倾向,即自觉地限制研究的范围,更为谨慎和具体地研究亚里士多德。我选译了该书的导论部分,目的就是想要让读者了解这一西方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新动向,同时,也为读者提供有关亚里士多德神学思想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而具体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各个专门领域,首先,在逻辑学方面,本选集选取了两篇代表性的论文。欧文的《亚里士多德论本体论的陷阱》一文,从分析哲学指称理论的角度出发,细致而颇具发明性地剖析了亚里士多德围绕 to on 这个概念所做的各种语言学和逻辑学上的论述,从而厘清了亚里士多德在这个概念上的思想层次,使我们真正深入到亚里士多德存在思想的核心。而弗雷德的《亚里士多德的诸范畴》一文,不仅是他本人的一篇代表作品,充分展现了他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中的独具匠心,而且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亚里士多德范畴概念的

真实内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他细致地分割了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划分相关的谓述(predication)、谓词(predicate)和存在(being)这几个概念,以此廓清在解读亚里士多德这方面著作时的种种疑团,为更为准确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开辟了一条明晰的进路。

而在形而上学领域,首先,罗斯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Aristotle's Metaphysics*)当然是一切企图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人的必读书。其长达140多页的长篇导言纵论了《形而上学》一书的结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学说,亚里士多德的神学,以及《形而上学》的文本等有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重要主题。其过长的篇幅当然不容我们全部选入,但是,考虑到其有关《形而上学》结构的部分对《形而上学》的文本性质、各卷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得非常详尽,许多观点和结论迄今难以动摇,是一切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因此,我在这里毫不犹豫地选入了这一部分内容,期望它能够为国内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起点,使我们不至于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而犯低水平的错误。

深入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内部,毫无疑问,实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核心。为此,我收入了弗雷德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实体》一文,这篇文章以特别发人深省的方式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实体概念的个体性内涵,同时也纠正了传统关于亚里士多德实体的一些错误认识,非常值得这方面的专业研究者一读。

但是,与实体问题相关,亚里士多德的偶性概念的内涵就成为我们相应需要关注和思考的内容。在这个方面,蒂尔内的《论亚里士多德“SYMBEBĒKOS”的意义》一文特别富有启发性。他细致梳理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文本和形而上学文本中有关“偶性”一词的用法和论述,分清亚里士多德偶性概念的内涵层次,从而相应地为我们准确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同事物本质相关的实体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因此,在本选集中,我专门收入了蒂尔内的这篇文章。

《形而上学》Z卷亦即第七卷是历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重心,围绕这一卷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并因此而专门形成了所谓的“Zeta学”。无论是欧文还是弗雷德都有关于这一卷的专门研究,而这一卷本身也存在着种种难解的问题。其中,学者们尤其反复讨论的焦点,是Z卷本身的编辑性质以及Z卷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问题思路。为此,我选入门恩2001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形而上学〉Z.10—16和〈形而上学〉Z卷的论证结构》,它基于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主题的新的理解,全面分析了Z卷的论证结构和论证主题,并且对其争议最大的第10—16章的思路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这是我翻译耗时最